

余国琮：一棵痴迷“精馏”的大树

袁希钢



余国琮在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留影

国，他深知“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

矢志创新

余国琮曾对我们说，二战后，美国的化学工业发展较快，但中国在基础研究的多领域仍有欠缺，应该有信心迎头赶上。改革开放后，他带领团队回到实验室，从大型精馏塔流体力学、基本传递现象以及热力学等基础问题着手，开始了艰辛探索。

板凳需坐十年冷。经过潜心研究，余国琮在精馏基础理论领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他和他的团队成为世界上开展精馏基础研究最为深入的学术机构之一。精馏领域世界顶级学者、英国Aston大学Porter教授对余国琮在实验基础上开展理论模型研究所表现出的远见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二人一拍即合，开展了为期近10年的中英合作研究。

基础研究回报也是丰厚的。余国琮团队的基础研究催生了“具有先进塔内件的高效精馏技术”等一系列应用技术，而这些技术成果在我国化工、石油化工、炼油以及空分等大型流程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和成功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庆油田首批斥巨资引进原油稳定装置，但由于装置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原油的特殊性，投运后无法正常运行和生产。外国技术人员在现场连续数月攻关，仍未能解决问题，巨额经济效益一天天流失。

余国琮应邀带领团队对这一装置开展研究，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并应用自主技术对装置实施改造，成功解决制约装置正常生产的多个关键性技术问题，最终使整套装置实现正常生产。不仅如此，经过他们改造的装置，技术指标还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

随后，余国琮又带领团队先后对我国当时全套引进的燕山石化30万吨乙烯装置、茂名石化大型炼油减压精馏塔、上海高桥千万吨级炼油减压精馏塔、齐鲁石化百万吨级乙烯汽油急冷塔等一系列超大型精馏塔进行了“大手术”。

这样的“手术”提高了炼油过程中石油产品拔出率1至2个百分点，仅这一项就可为企业每年增加数千万元效益。

进入21世纪，化学工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原料和燃料，支撑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精馏作为覆盖所有石化工业的通用技术，在炼油、乙烯和其他大型化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余国琮认为，工业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必须先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取得突破，打破原有理论框架桎梏，引入结合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此，他提出了应用现代计算技术，借鉴计算流体力学、计算传热学的基本方法，结合现代物质传递、扩散理论，针对精馏以及其他化工过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化工计算传热学理论，而最终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精馏过程的工业设计中经验的依赖，让化工过程设计从一门“艺术”逐步走向科学。

经过多年探索，余国琮团队首次实现了精馏塔内浓度分布的严格模拟，在预测精馏分离效率的严格理论模型和方法上向前迈出了一步。

为人师表

余国琮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一名“教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最大的职责。”

85岁那年，余国琮还坚持给本科生上一门“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与创新”的创新课。一堂课大约要持续3个小时，学生们怕老先生身体吃不消，给他搬来一把椅子。可他却总是拒绝：“我是一名教师，站着讲课是我的职责。”听过他课的人都说，先生把讲课当成了一门艺术。

为祖国培养化工类优秀人才、潜心探索化工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是余国琮心目中的首要职责。他提出的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等研究成果全面提升提升了化工本科教育理念，于2001年和2005年两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曾有人问过余先生为什么这么拼命，他说：“在国际国内高水平论坛上的任务是交流，我们要把国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引进来，要把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推出去；科普工作则更为重要，为大学生讲课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能多讲一些就多讲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支持、投身、热爱祖国的化工事业，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化工类人才。”

我时想起余先生伏案工作时的样子，他仿佛一棵胡杨，总是笔直矗立，指向天空，即使被岁月风化，也会留下一圈一圈无悔的年轮。

（本文为作者为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天津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委、民进中央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委。）

郑振铎的骨气

周二中



郑振铎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史学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同时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成立，郑振铎因故未能参加民进成立大会，但因为他为民进的创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3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兼常务理事。

郑振铎是位有骨气的文化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举国皆惊，郑振铎更是义愤填膺，他参加了抗议游行，在上海宝山路上海路反党派枪击。随后，他又与胡愈之等人联名在报上发表抗议信，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此他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迫出国避难。

抗战期间，汪伪政府四处拉拢文化界知名人士来为自己装点门面。鉴于郑振铎在社会上的良好口碑与知名度，要是能将郑振铎拉到政府中来任职，影响力非同小可。当时，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以前是郑振铎的朋友，他跳出来说客。

樊仲云知道郑振铎好书成癖，只要在书店里死守，一定能找到他。果不其然，樊仲云在书店里蹲守了几天，一天看到身材高大的郑振铎走了进来，樊仲云喜出望外，兴奋地走了过去，拍了拍郑振铎的肩膀说：“郑老兄……”郑振铎回头一看，发现是此人，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郑振铎二话不说，扔下书就跑了。



梁漱溟向学生道歉

张雨

1918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当他引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观点时，有个叫陈勇浩的学生始而举手，继而用尼采的话有问题，我记得尼采是这样说的。”说着就把尼采的原话背了出来。

梁漱溟听了，一时有些尴尬，但他对学生说：“难道你不认可我的讲课，对我的看法表示怀疑吗？”那个学生低下头，同学们纷纷指责他出风头，在师生面前显示自己，竟公然顶撞老师。陈勇浩趴在桌子上，沉默无语。

回到办公室，梁漱溟找到尼采的原著进行对比，这让他大吃一惊，竟然发现陈勇浩说的才是正确的。他立刻返回班级，走到陈勇浩的跟前，认真地说：“陈勇浩同学，我真诚地向你道歉，为我自己的武断感到愧疚。”听了梁漱溟的道歉后，陈勇浩竟然没有站起身来，只是埋头不让大家看见他的脸庞。

梁漱溟向学生道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北大。有的老师

问梁漱溟：“这个学生也太不识相了吧！你这般道歉，他竟然这般态度！”梁漱溟却笑着说：“他会原谅我的，但这需要时间，他要慢慢原谅我。你想想看，这件事原本是我的错，却让你难堪，即使我向他道歉了，他也很难当下就原谅我。这需要时间，我当然会给他一些原谅我的时间。”

过了几天，陈勇浩来到梁漱溟办公室。他走到梁漱溟面前说：“对不起，梁老师，那天我对您无礼了。其实，您是我心中最敬仰的老师。”梁漱溟站起来轻轻地拍拍陈勇浩的肩膀，说：“原本就是我太过狂妄，这次也是对我的一次告诫，让我知道没有足够的把握，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

梁漱溟向学生道歉后，却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他并没有对学生的无礼耿耿于怀，也没有用自己的光芒去打压对方，而是认为需要给对方一些原谅自己的时间。他在拥有一流学识和一流师名的同时，依然拥有磊落的胸怀和可贵的谦逊，这才是大师的风范。



杨绛说傅雷性格

杨建民

傅雷翻译文字好，一部“家书”风靡数十年不衰，着实让人着迷。可他的为人、性格方面，表述的人不多，或深切体会者有限。杨绛该算是体会其中一人。

抗战时期，在上海，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大家压抑，傅雷家客厅成了钱锺书夫妇常去夜谈“破闷”的场所。杨绛对傅雷的印象是：“我闭上眼，最先浮现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人。”这与其他文字描述的傅雷有些不同。杨绛说：傅雷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杨绛有着女性的细致感觉，又有好文笔，描述到位，傅雷这可喜的一面，被她寥寥数笔刻画下来。

首先说到这一面，是因为其他人约”运动，出席“闹洋关”集会和烈士追悼会，发表演说。

《福建日日新闻》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1906年春，同盟会派福建人李竹痴前来厦门，商议将《福建日日新闻》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但不久后《福建日日新闻》被清政府查封，前后不到一年。连横一生十分崇拜郑成功，两次险遭暗杀。连横被迫躲在了厦门的工作，返回台湾。

日据时期，连横看到殖民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摧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他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怀着“生根台湾，心怀大陆”的爱国情怀，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连横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的曾祖父在我爷爷13岁那年，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告诉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

连横用10年的时间遍阅资料，最终编成了《台湾通史》。《台湾通史》为文言纪传体史书，共88篇，约60万余言，完整地记载了台湾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共1290年可以确稽考的历史，为今天我们全面而真实地了解历史，考究两岸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可借鉴的历史资料。

【链接】连横（1878—1936年），台湾台南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龙海），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著有《台湾语典》《大陆诗草》等作品，在40岁撰著《台湾通史》，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

感触或描述有限，傅雷的其他方面，杨绛当然有感受：“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

杨绛回忆说，有一次自己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傅雷当面称赞。杨绛自觉翻译一般，所以认为傅雷也是一般友人的敷衍。“也照例谦逊了一句。”不料，“傅雷悄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问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对傅雷这样的特别反应，几十年后杨绛记述：“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谢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

通过这件事，杨绛认为：“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除去其中杨绛谦逊的成分，作为翻译家，傅雷在修养方面的襟怀，可见一斑。



叶灵凤设计书刊

周惠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灵凤除了以小说和散文著称文坛外，还以收藏并设计图案精美、寓意丰厚的藏书票和设计图案、立意丰富的书籍封面而闻名遐迩，而他的书刊装帧，在其艺术生涯中同样令人瞩目。

叶灵凤毕业于上海美术专，1925年进入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出版部，开始涉足图书刊物的装帧艺术。1925年9月，《洪水》半月刊问世。在创刊号的封面上，叶灵凤向世人展示了他装帧艺术的才华。画面上端由一只鹰和两条蛇的图案构成，鹰的胸前佩着一把剑；下端是滔滔洪水，洪水中冒出海螺、海贝外，还冒出了一个尖嘴圆眼的凶神，洪水旁则丢弃着一只被撕破了的假面具。整个画面寓意“这是一头撕碎旧社会假面具的洪水猛兽”。到了第8期时，封面图案改成了洋洋洪水淹没大地，人们正向山顶、树上逃去；远处浪花飞溅，海鸥正展翅飞翔……第13期时，封面又改为一艘大舰正劈波斩浪、乘风破浪。

叶灵凤还在《洪水》的目录页和

解密“台湾文化第一人”

——连横与鼓浪屿的渊源

本报记者 照宁

从厦门鼓浪屿的钢琴码头上岸，走过黄家渡，从龙泽花园旁的巷子走进，便是福州路。这一路，几乎没有游客，更没有店家，很安静。在鼓浪屿艺术幼儿园的门前，抬眼看得见那高处的房子，一段长长的石阶，石门边的门牌上写着：福州路199号。这幢掩藏在绿树浓荫中的两层英国维多利亚风格别墅，是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曾在鼓浪屿居住过的地方。

连横一生5次回大陆，其中两次是在厦门办报。1902年8月，连横从台湾回来到福建参加补行经济特科乡试，即省一级举人考试。然而他激进的新思想惹恼了主考官，考官在连横的试卷上批了两个大字：“荒唐！”连横落榜。在回台湾的途中路过厦门，正好看到由英国伦敦公会牧师山雅各创办不久的《鹭江报》在招聘主笔。他前往应聘，被录取后就留在了鼓浪屿。

当时的《鹭江报》编辑部共有13人，除山雅各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并且有不少名人，如马约翰、卢戇章等，连横是最晚加入的。期间，连横曾用史学的角度撰写了长篇专论《满洲最近外交史》，在《鹭江报》上连载了10多期，为读者提供了一份



厦门鼓浪屿福州路199号

清朝政府卖国外交的历史档案。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主张男女平等和人权新说的文章，名噪一时。但《鹭江报》实际上是英国和清朝共同利益的代言人，连横无奈在1903年年底辞职返回台湾成家。

鼓浪屿的日光岩是郑成功当年屯兵扎营操练水师之处，这里风光绮丽，远近知名，连横一生十分崇拜郑成功，所写歌颂郑成功的诗歌，数量甚多，质量也很高。如《游鼓浪屿》：

倚剑来寻小洞天，延平旧迹委荒烟。一拳顽石从空坠，五色蛮旗绝海悬。带水犹存唐版籍，伏波已失汉楼船。日光岩畔钟声急，时有鲸鱼跋浪前。

连横在郑成功当年屯兵而凿的鹿泉吟诗：

痛饮狂歌试鹿泉，中原何处着先鞭？
麾戈且驻乌衣国，倚剑重开赤嵌天。
故垒阵因云漠漠，荒台碑碣水连连。
时朝鼓浪山头望，极目鲲鲸几点烟。

其中，乌衣国指厦门，赤嵌天指台湾，郑成功正是从厦门出兵收复台湾的。连横流连其间，写下了抒发爱国热情、表达承担天下兴亡决心的《鹭门旅兴》《厦门秋感》《万石岩》《鹭江秋感》《在厦东乡中诸友》《留别林景商》《携眷归乡离别厦中诸友》等诗篇。诗中引经据典，传达出来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1905年春夏间，连横携家眷再次来到厦门，与爱国华侨、戊戌变法时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黄乃裳，以及蔡佩香等好友创办了《福建日日新闻》，出任主笔。当时，他与家人借住在鼓浪屿山雅各的寓所，每天乘坐小渡船往返于厦门与鼓浪屿之间。在此期间，他目睹了鼓浪屿被帝国主义侵略，美丽的鼓浪屿成为洋人“天堂”的情景。这进一步激发了连横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积极投身到厦门的“反美拒